

新中国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认同历程探析

胡春阳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这一基础性工作, 先后历经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确立、曲折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畸变、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回归和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发展等不同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认同; 新中国

DOI:10.13658/j.cnki.sar.2020.04.007

作者简介: 胡春阳, 法学博士, 曲靖师范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20)04 - 0071 - 09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是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可、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 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外化为社会生活价值准则的动态过程。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 即 1949—1956 年,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充分利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资源进行政治动员并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另一方面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以改善, 有效地巩固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 利用旧中国提供的“负面合法性”激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负面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形, 即通过新生政权的宣传引导民众对新旧两种社会进行比照, 通过这种对比凸显出新社会的优和旧社会的劣, 由此使民众自觉产生一种对新政权认同的情感。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就借助“对旧政权如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腐朽、暴虐、昏庸及法西斯专制统治等给旧中国带来的阴暗面, 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行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项目编号: 17BKS042); 曲靖师范学院专项研究项目“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程研究”(项目编号: 2019ZX002)。

的揭露及对腐朽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描述”^①，强化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效应，迅速增强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以抗战后国统区为例，1949年底物价上涨了4万亿倍，工商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显著增加，民众生活难以为继。但“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②国民党政府的“负面合法性”在政府官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漫不经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贪污腐化的行为，日益腐蚀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则进一步强化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效应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从1950年冬季开始，人民政府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运动，通过访贫问苦，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贫苦农民“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等方式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这些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出农民“感谢新社会痛恨旧社会”的朴素情感，在心理认知层面“更加确认了共产党是最有资格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④从而对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高度认同感。

(二) 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永远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可能掺杂着冲突的、甚至矛盾的世界观”。^⑤新中国成立后，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且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利于政权的巩固。为此，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巩固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府就有组织地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发行，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掀起了学习热潮。近百万大中小学教师及机关干部参加了学习，青年学生接受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主的政治教育的人数在百万以上。这些措施迅速清除了旧意识形态的影响，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南，也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 夯实经济基础 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就是要首先满足人们对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需求。”^⑥通过发展经济可以迅速改变人民群众落后的生活状况，让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直接的感知，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自然而然了；况且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年代曾经许下的政治承诺在革命成功后也需要逐步兑现，毕竟“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⑦

在这一客观要求的推动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很短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就取得了巨大的

① 王东明《建国初期新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资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②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页。

③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中卷，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644页。

④ 王先俊《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⑤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⑦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

成就。“一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1956年职工平均工资比1952年提高了36%,农民收入增长了24.3%,社会购买力达到465亿元。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得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不断增强,对此弗里德里克·C.泰维斯认为“总体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1949年以来还是非常成功的。由于在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条件和恢复国家声望等方面的成效,共产党还是取得了极其广泛的群众支持。”^①

二、曲折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畸变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就政治管理角度而言,要保持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认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实现从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的转变,但从1957年开始至“文革”结束期间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而片面强调精神调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的地位,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格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因此逐渐发生畸变。

(一) 片面强调精神调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的作用

1957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随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国民收入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②人民陷入普遍贫困的境地。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国民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应该成为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制约性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单一化对民众精神世界的调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获得很高的认同度。执政党在这一时期不断向民众灌输脱离中国实际的理想社会模式感召民众、动员民众,激发民众为实现美好未来而奋斗,在“政治挂帅”的思维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亦被视为实现伟大理想的必经阶段,再辅之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的群众性意见表达方式,此时民众的认同表现为狂热的集体无意识。虽然片面的精神调控契合了民众易于接受带有激进色彩的、表达终极价值与关怀的思想观念,暂时获得了普遍认同,但其后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要长期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最终还是要靠经济的支撑,使民众得到真正利益,片面地强调精神调控的作用只能获得非理性认同。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人格化倾向

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逐渐演变为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并打上了浓重的人格化烙印。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基本上是自然产生的,还没有发展到个人崇拜的地步,但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逐步树立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2年林彪以“突出政治”为名,首先在军队中倡导和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由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政治号召、媒体宣传等各个方面相互作用和反馈,不断放大演化成一种普遍的政治迷信,并由各种仪式予以强化和固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人格化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强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对

① 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② 张奕曾《新中国经济建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有其积极的一面。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已被民众视为党和国家的象征,领袖的个人权威在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①但另一方面,过分夸大领袖人物的作用、制造个人崇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如帕金所指出的“任何持久的政权都不能仅仅依靠它的公民们对伟大人物的信仰去赢得对它的服从。”^②个人崇拜会使主流意识形态沦为个人的附属品和工具,民众对认同则蜕变为对领袖人物的盲从与迷信,使其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置于党和国家之上,从而背弃集体领导原则,最终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被严重地消蚀。

三、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回归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政治思想领域的混乱并没有真正消除,“两个凡是”的提出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崇拜,加上长期滞后的社会生产不能给民众带来利益和需求的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日益凸显,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回归已成为党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开始步入正轨。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启。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的突破口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打开了突破口。

一方面,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的序幕。1978年5月11日,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邓小平所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③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廓清了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困惑,解决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对象的首要问题,拉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的序幕。

另一方面,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避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迷失。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民众“易于把政体与个别领导人相提并论”,^④党的领袖常被民众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的化身,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对象。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旦有失公允就“很容易变为攻击政治制度本身的炸弹。有关具体政策或具体义务的争论很快便会提出制度存亡的根本性问题”。^⑤因而“文革”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将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问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② 弗兰克·帕金《马克思·韦伯》,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④⑤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38页。

了正确总结,科学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两个凡是”产生的负面效应,避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迷失。

2. 人民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的价值旨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政治本色的根本标志,其核心就是始终遵循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遵循的实践逻辑,人民性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整个过程,并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重启的价值旨归。

对于为什么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②“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③中国共产党“要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关注人民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提出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重新走上正轨。

(二)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提升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中通过夯实政党认同基础、摆脱传统发展观的困境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夯实政党认同基础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世纪之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此外,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从内部消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党在这一时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希冀通过夯实政党认同基础来捍卫党的执政合法性,并以此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认同。

所谓政党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心理及情感上对某一政党相对稳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将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民众对政党的支持”。^⑤政党认同的基础主要涉及执政党的政绩、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以及利益分配格局,这三个方面的资源在增强政党执政合法性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顺应21世纪初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要求对政党认同进行的深刻诠释。

第一,就执政党的政绩层面而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执政党的政绩为民众提供最直接和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此佐证执政党的正义性,从而实现增强政党认同的目的。民众对于政治产品的需求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但首要的是生存发展的需求,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奋斗史表明,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此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中

①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63、342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7、255页。

⑤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s Vote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Press.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站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前沿,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历史使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这也构成了新时期我国政党认同的逻辑起点。

第二,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层面而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意识形态资源在政党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时比其他方式效果更为明显。在21世纪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的西化、分化策略以及多种社会思潮的泛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目的是通过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来巩固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是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亦是对亿万民众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整合,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党认同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第三,就利益分配格局层面而言,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先进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认同就是因为其政治主张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回应了民众的利益要求。世纪之初我们党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②原理,既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新概括,也是社会主义利益原则的实践,体现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从根本上解决政党认同问题找到了现实基础。

对于政党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而言,政党认同尤其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果,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感知常来源于执政党成员的模范践行,“尊其师则信其道”,对执政党的认同度越高,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易得到民众的认同。正是遵循这一理论逻辑,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夯实政党认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有效地化解了各种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冲击。

2. 科学发展观:摆脱传统发展观困境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基本需求来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在发展模式上仍带有浓厚的传统发展观色彩,致使后来出现了“改革获利的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的较大的反差,使作为认同主体的社会劳动者阶层的要求与政治产品的获得与满足之间出现差距”。^③传统的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仅把经济增长视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来源,势必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思维惯性:如果一个时期有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执政党及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获得民众高度的认同;反之,一旦经济出现暂时的停顿与挫折,民众失望之时,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危机之日。对此,有学者这样评论:“如果你只有一匹马——经济,而这匹马又绊倒了的话,那你就哪儿也去不了。”^④另一方面,传统发展观模式下高度关注经济增长,而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凸显,经济结构失衡加剧;区域发展不协调,尤其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过大,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增多,不断消解着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③ 方旭光《认同的价值与价值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④ 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因此,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还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①

基于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了发展内涵、发展要义:一方面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增进政治价值认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价值聚焦于以人为本,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关注民众的福祉,谋求构建社会和谐蓝图,积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发展理念既符合现代社会化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切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既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谋发展,又是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贡献。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增强了执政党和民众间的政治凝聚力,在增进政治价值认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另一方面以良好的发展赢得民众的利益认同与情感认同。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实践层面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利益,使民众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充分地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力量源泉。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在指导实践中有效地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一)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基础

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当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获得感主体的人民性。让全体人民都有获得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引下推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价值评判。其次,获得感内容的全面性。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涉及民生保障以及在促进个人、社会发展时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②最后,获得感实践中的可感知性。获得感最终表现为对物质和精神“实惠”的切身感受,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可感知性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应具有可持续性,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将来能够更多、更好。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回应和承诺,又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通过解决民生问题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为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 保持党的纯洁性,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生态环境

随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易获得认同。在我国,

^① Joseph Fewsmith.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② 习近平《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介质,认同党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融为一体,但这种认同不是凭空产生的,与党的纯洁性息息相关。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准则和坚守的核心价值理念,同党的先进性始终趋于一致。能否保持党的纯洁性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效果。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优化政治生态环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政治实践的前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党的建设和权力监督体系,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坚定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党政治生活的灵魂,针对部分党员精神空虚、信仰迷失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①第二,严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保证党团结一致的重要前提。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②为此需要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三,狠抓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改进工作作风,让“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③第四,严格把控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不断完善以党章为主、党内法规为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通过编织约束权力的“铁笼子”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建设廉洁政治。上述举措实现了党建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中展示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坚定决心和有效手段,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基础。

(三) 彰显与时俱进理论品格,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获得人民群众认同就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理论创新与时代同步发展,对民众关心的时代命题作出让人信服的阐释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④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敢于直面国际国内复杂的时代挑战,深刻回答了许多重大的时代命题,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一是在进行伟大斗争中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作用场域、斗争形式、社会背景、历史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伟大斗争中与时俱进,破解时代难题、解决重大矛盾,并在斗争实践中取得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二是在建设伟大工程中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要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三是在推进伟大事业中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必然要催生新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四是在实现伟大梦想中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孕育了

①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4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伟大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践中开辟了理论的新境界,不断地指引全国人民为早日实现伟大梦想而奋斗。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不能故步自封,要想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就必须及时地科学地回答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了这些基本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基础。

(四) 分享中国经验,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又在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分享中国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立图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凸显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世界意义。

1. 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机制和空间模式进行了当代的诠释,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机活力,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中国样本,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新篇章,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且让其他国家可以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制度局限和矛盾弊端,拓展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其经验弥足珍贵。

3. 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蕴含“中国智慧”的新方案,在实践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展示出社会主义中国的责任担当与胸怀。当前,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人类的选择不外乎两种:一是为获取有限的资源相互争斗,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时代的主题背道而驰;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通力合作应对挑战,这是全人类的意愿。在人类携手建设美好未来的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且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得以践行。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在推动本国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消解二十世纪末苏东剧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促进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世界范围的拓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李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